

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

◎ 许学强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

许学强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本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体系和城市规划核心问题的理论性专著。全书分5部分30章。由我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城市学研究权威之一、中山大学许学强教授撰著。

第一部分（1~8章），城市化与空间差异。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波动的因素，分析了城市化、城市首位度省际差异和城市化时空演变等。第二部分（9~16章），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分布。对中国城镇体系发展历程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和预测，并对中国城镇体系的不同阶段和规模以及人口增速等问题作了广泛研究。第三部分（17~20章），城市人口与城乡人口迁移。对城市合理规模、人口结构、分布与迁移等作了理论性研究与概括。第四部分（21~24章），城市产业与城市职能。深入探索了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特点，对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等作了论述。第五部分（25~30章），城市规划与规划方法。主要提出了人口预测和城镇体系规划方法，运用城镇等级规模系数分析了人口规模和工业布局等。

本书可供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城市学以及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学科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许学强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6

ISBN 978-7-03-034672-8

I. ①中… II. ①许…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0149 号

责任编辑：吴三保等/责任校对：包志虹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耕者设计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1/2

字数：508 00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自序

我写文章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年已 40。结合城市规划工作撰写和发表了《分析和预报城市人口的几个数学方法》(1979)、《根据区域经济因素预测城镇人口规模的一个数学模式——以广东县城为例》(1979) 两文。当时没有计算机，整个广州也只有广东省统计局、中山大学两个计算中心，谁用要预约，要付款，每次限一个钟头。第二篇文章要处理 94 个县的社会经济资料，没有中山大学气象系陈创买老师的帮忙是无法完成的。今天看来，虽然此文在变量的选取上还有些局限，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还是可以解释一些问题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到国家建委办事，拿着中山大学和国家建委的介绍信，顺便到国家公安部抄写了 1949 年、1953 年、1963 年、1973 年、1978 年的全国所有城镇(市)的资料。抄了好几天，好友梁锦宣老师也帮我抄。利用这些资料和我夫人李美伦教授 1978 年从美国买回的一个计算器(能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及看英文书学到的一点理论和方法，我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英文)。头三篇为《我国城镇规模体系的演变(1949~1978)》、《我国城镇分布及其演变的几个特征(1949~1978)》和《省会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与控制(1958~1978)》。三篇同投《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疑为粗制滥造之作被退回。于是，我分别改投《经济地理》、《中山大学学报》、《城市规划》，全部录用，甚是高兴！随后，结合工作和培养学生写了一些同类文章(已另汇集成册)。

1982 年我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的资助，应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中心(现为城市规划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郭彦红教授邀请，前往该中心合作研究一年，有机会与香港郭彦红、叶嘉安、梁志强、薛凤旋、杨汝万、朱剑如、李思名、陈金永等地理同仁认识，学习合作，先后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我国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的文章，其中英文 20 余篇，已以英文论文集 *Urban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由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在香港期间还有幸见到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及接待了不少赴港的大陆学者。

也在 1982 年，我们以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发展综合研究中心的名义，向加拿大国际开发研究中心申请 20 万加币开展珠江三角洲城乡发展综合研究，报教育部、省政府层层审批，最后被当时一位领导以不能用外国人的钱搞自己的规划为由否定了。直到 1986 年，我有机会申请到美国王安基金会资助和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委托，开展“对外开放政策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的研究。随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穗港深点轴发展及其地理扩散”、“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动态模型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港澳—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地区协调发展研究”，加上 1991~1997 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给予的国际合作项目资助等，支持了我们持续开展

珠江三角洲的研究。

正当我处于晚到的学术兴奋期，一不小心踏上了仕途。1987年10月任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1988年9月任中山大学地学院院长，1990年2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92年3月任广东省高教厅厅长，后兼中共广东省委高校工委书记，中共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等职。繁重的行政事务严重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只能每星期四晚同我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们一起，研究学术问题，维系学术文脉。一晃就是十年！年逾花甲，难负重任，只能在某些方面做一点拾遗补阙的工作。“帮忙不添乱”就是好同志！

时逢建系80周年纪念，李郇教授及其学生将我及我与学生合作发表的有关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文章系统整理，汇集成册出版。在此，谨以此书献给母系，同时表达对曹迁藩、梁浦等众多老师和同仁们对我的关心、指导和帮助的感谢和敬意。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李郇教授及其学生用了许多时间来整理这些文章，感谢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目 录

自序

一、城市化与空间差异

1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1949~1982)	3
1.1 城市人口规模的“神话”	3
1.2 城市人口统计	4
1.3 城市人口的定义	7
1.4 1949~1982年城市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趋势	12
1.5 1966~1976年城市扩张与城乡人口迁移	16
1.6 结论	24
2 中国城市化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1949~1982)	26
2.1 1949年后城市化进程	26
2.2 城市化特征的影响因素	32
2.3 结论	35
3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首位度的省际差异 (1949~1981)	37
3.1 城市化, 政治与公共政策	37
3.2 城市发展的省际分布	39
3.3 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	42
3.4 城市首位度的省际差异	47
3.5 结论	51
4 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990~2000)	53
4.1 改革开放前城市化进程的回顾	54
4.2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总体发展概况	55
4.3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影响因素变化	58
4.4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模序位省际差异	64
4.5 结论	68
5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判断	74
5.1 城市化及其测度	74
5.2 人口城市化水平及其修正	74
5.3 城市化水平综合判断	75
5.4 小结	78

6 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城市化	79
6.1 问题提出和调查结果	79
6.2 城市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分析	80
6.3 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自动安置	82
6.4 外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84
7 城市化空间过程与空间组织和空间结合	88
7.1 城市化是一种空间过程	88
7.2 城市化过程与地域空间组织	90
7.3 城市化过程与地域空间结合	92
7.4 结论	93
8 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动力和类型	95
8.1 概念的选择	95
8.2 乡村—城市转型动力分析	96
8.3 乡村—城市转型类型	98
8.4 结论	99

二、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分布

9 中国城镇规模体系的演变（1949～1978）	103
9.1 国民经济发展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	103
9.2 城镇规模大小与增长速度	105
9.3 城镇规模结构与序列分布	108
9.4 城镇规模体系的预测	111
10 中国城镇分布及其演变的几个特征（1949～1978）	113
10.1 城镇密度	113
10.2 城镇分布类型和集聚形式	116
10.3 城镇分布变化	119
10.4 小结	125
11 中国城市体系发展中的新城市（1953～1986）	126
11.1 市和镇	126
11.2 公共政策和城市体系发展	127
11.3 1953～1986 年的城市体系发展	128
11.4 1983～1986 年城市体系的区域分布	142
11.5 消亡城市和新增城市的特性	149
11.6 结论	150
12 中国城市体系演变的新趋势（1978～1990）	152
12.1 城市扩展与城市人口增长	152
12.2 位序—规模分布	154

12.3 空间布局.....	158
12.4 结论.....	160
13 中国城市异速增长的分析 (1990~2005)	161
13.1 概述.....	161
13.2 关于城市异速增长原理的讨论.....	162
13.3 数据处理.....	164
13.4 城市体系异速增长的讨论.....	165
13.5 分析结果的含义.....	168
13.6 小结.....	170
14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及其对城镇体系的影响.....	171
14.1 开放政策与经济的全球化.....	171
14.2 外国投资的空间分布.....	174
14.3 全球化对城镇体系的影响.....	176
14.4 全球化所引致的城镇体系发展问题.....	179
14.5 结语.....	181
15 从西方区域发展理论看中国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	182
15.1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与大城市.....	182
15.2 农村发展理论与小城市.....	183
15.3 区域综合发展理论与建立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的城市体系.....	185
15.4 结论.....	186
16 关于城镇体系研究的几个问题.....	187
16.1 城镇体系的基本特性.....	187
16.2 城镇体系规划研究的主要内容.....	188
16.3 提高城镇体系规划研究的水平问题.....	191

三、城市人口与城乡人口迁移

17 中国省会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与控制 (1953~1978)	195
17.1 省城规模特征.....	195
17.2 影响省城发展规模的因素分析.....	196
17.3 控制省城人口规模的意见.....	198
18 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分析.....	200
18.1 概述.....	200
18.2 研究方法: Moran's I	201
18.3 数据与样本.....	202
18.4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现状分析.....	203
18.5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规律的演变.....	205
18.6 结论与讨论.....	209

19 中国新城市的人口结构初探	210
19.1 新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	210
19.2 新城市的人口性别构成	213
19.3 新城市人口的劳动构成	214
20 经济改革与城乡人口迁移	220
20.1 农村剩余劳动力	220
20.2 政策背景	221
20.3 人口迁移流	223
20.4 广州的外来人口	224
20.5 迁移类型	226
20.6 结论	227

四、城市产业与城市职能

21 50年来中国城市主导功能的发展变化——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生活城市的转变	231
21.1 城市主导功能的转变规律	231
21.2 城市主导功能的转变	232
21.3 把握机遇，通过城市主导功能的转变，促进社会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234
22 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现状特点	236
22.1 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236
22.2 城市产业结构现状特征	236
22.3 小结	241
23 生产分包和边缘区发展	242
23.1 分包的形式	242
23.2 分包的动力机制	243
23.3 分包的空间规律	245
23.4 边缘区经济发展：问题和启示	246
24 中国城市职能演变的回顾与展望	249
24.1 城市职能	249
24.2 城市职能演变的回顾	249
24.3 全球化推动城市职能向专业型的综合服务职能转变	252
24.4 小结	254

五、城市规划与规划方法

25 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发展	259
25.1 主要发展过程	259

25.2 主要经验教训.....	262
25.3 展望.....	267
26 分析和预报城市人口的几个数学方法.....	271
26.1 五个简单的数学模式.....	271
26.2 简单模式的回归分析.....	275
26.3 逐步回归法.....	279
26.4 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预报法.....	284
27 根据区域经济因素预测城镇人口规模的一个数学模式——以广东县城为例.....	288
27.1 因子选择和主要计算公式.....	288
27.2 计算结果分析.....	293
27.3 各因子与县城人口规模的回归分析.....	296
27.4 计算结果的运用.....	299
27.5 小结.....	304
28 城市规划中的人口分类问题.....	305
28.1 城市规划中人口分类的不同方法及其相互关系.....	305
28.2 城市基本人口和服务人口划分对城市规划的重要意义.....	306
28.3 问题与看法.....	309
29 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和方法.....	312
29.1 关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312
29.2 城镇化水平和城镇体系规划布局研究.....	314
29.3 关于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规划布局研究.....	316
30 城镇体系可持续发展规划初探.....	319
30.1 城镇体系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理论和方法.....	319
30.2 城镇体系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目标和内容.....	321
30.3 城镇体系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工作步骤.....	323
30.4 结语.....	323
参考文献.....	324

一、城市化与空间差异

1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1949～1982）*

1.1 城市人口规模的“神话”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和政策已经成为目前众多关注的焦点。中国模式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大规模的“下乡运动”，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前往农村地区工作，通过粮食配给和户口制度对城乡流动进行严格控制，以及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农村就业。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控制城市人口增长是件很困难的事。然而在中国，这方面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因此，中国模式或许能够为这些国家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

近年来，尽管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文献大量涌现，可使用的统计数据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尤其是1982年人口统计数据的公布，但城市人口的研究仍然受定义界定问题的困扰而举步维艰；实际上，中国城市人口的真实规模仍旧是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神话”^①（Laurence, 1983）。我们只需要采用 Leo Orleans 提供的最新的方法进行检验，以搞清楚国内外文献中有关城市人口统计中的少量混淆之处，以及在处理城市发展定量方面产生的问题。

例如，1982年6月美国联邦统计署公布的1981年底中国城市人口为1.387亿（占全国人口的13.9%）^②，1982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出1982年6月中国城市人口总数为2.066亿（占20.6%）（国家统计局，1982）。另一个例子是上海，据称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人口超过1000万，但很多中国学者估计上海的城市人口只有500～600万。

实际上，一个60年代以来相对完整的时间序列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1981年才首

* 陈金永、许学强1985年12月发表于英国伦敦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原名为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49.（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① For Example. Rhoads Murphey.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revolutionary mode. Proceed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 (1975). pp165～168; Reiitsu Kojima ed. Chugoku no Toshika to Noson Kensetsu (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okyo: Ryukenishosha, 1978); Laurence Ma. Counter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strategy of hsia—hsiang. Current Scene. V01. 15. Nos. 8 and 9 (August—September 1977). pp1～11; and Murphey. 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 City and Country in China's Development (New York: Methuen, 1980).

② Leo Ai Odeans.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concepts, conglomeration and concerns. In: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 S. Congress.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Pt I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pp268～302. Another more recent, but unsuccessful, attempt by Orleans and Ly Burnham to solve this “riddle” came to the authors' attention just prior to preparing this article for publication [“The enigma of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Asian Survey, Vol. 24. No. 7 (July 1984), pp788～804]. Central issues like the changes in urban definition have not been resolved (compare Table I in their paper with Tables 3 and 5 in this article).

次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稍后在其他的中文杂志出现，包括《中国统计年鉴——1981》^①。这个序列（文中作为序列 A 引用^②）给出了 1960 年以来各主要年份城市人口数据：1.307 亿（1960 年），1.017 亿（1965 年），1.023 亿（1970 年），1.117 亿（1975 年），1.286 亿（1979 年），1.387 亿（1981 年）。此序列数据在后继研究文献中被频繁引用。因此，一个关于中国城市人口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停止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的看法，广为流传。此外，假定该时期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持续为正，那么就意味着存在城市人口的净迁出，这与已有文献中所强调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在反城市发展战略中所起重要作用是一致的。此外，很多中国学者通过比较 1950 年和 1980 年的城市化率（1950 年，11%；1980 年，13%），也认为 1949 年以来中国没有显著的城市化。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意见，并认为由于统计口径不同，这些城市人口数据没有直接的可比性。

考虑到城市人口规模研究对指导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更多信息可供获取，本文将在一些细节上就该问题进行重新探讨。本研究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剖析城市定义，城市人口统计和类似城市人口统计之间的关联；第二部分分析 1949 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特征，特别探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征。此外，还着意关注了 1966~1976 年间的城乡人口流动。两部分内容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以前各种城市数据，以便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增长过程形成一个较完整清晰的图景。中国是否已经成功实现了缓慢城市增长呢？这个问题将在文中得到答案。

1.2 城市人口统计

在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城市区域：城市和城镇^③（国家人口普查委员会，SSB 人口统计司，1982；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UNPD)，1980；张泽厚、陈玉光，1981；田雪原，1983；张纯元等，1983）。地级市作为属下若干县的代管机构，又能再划分为两部分：中心市区（市区或市辖区）和郊县（或市辖县）。下面以上海为例来解释说明（图 1.1）。上海作为一个直辖市，其中心城区一般认为就是城市，大部分为建成区；郊县是由 10 个县组成的广大地区，农业活动占主导地位（图 1.2）。相应地，市域人口（全市总人口 TPM）根据常住地统计分为市区人口（TPC）和郊县人口两部分（在 1982 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中，某个地区的常住人口定义为在该地区居住，

^① 中国统计年鉴 1981, p89; 现代中国经济词典,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p14.

^② 此序列引自 J. S. Aird, "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8, No. 2 (June 1982), p280.

表 2: A. J. Jowett, "The growth of China's population, 1964~1982."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50, No. 2 (July 1984), p156.

表 3: Shigeru Ishikawa,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49—an 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4 (June 1983), pp242~281.

我们需注意的是 J. S. Aird 的文章中表 2、表 3 的部分数据是不具可比性的。

^③ 见例子: Zhang Changgen, 上海: 1949 年以来的人口发展; Li Zheng 等, 中国人口: 问题与前景.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1980. p129.

时间至少为一年以上的人口，不再根据户口所在地进行统计（吴友仁，1981）。应该指出的是，在字面意思中市域人口与市区人口很容易混淆。尽管准确地说，TPC（市区人口）在中文文献里是指市区总人口，但更多时候TPC也被当作市域总人口。之所以概念模糊不清，主要是因为在中文里“市”既可以是“城市”也可以是“直辖市”。比如上海总人口根据前面的定义，既可以指上海整个行政区范围内的总人口，也可以是上海市区的总人口。因此，只有对上述不同的人口概念作特别的说明，人们才能明白它们的确切含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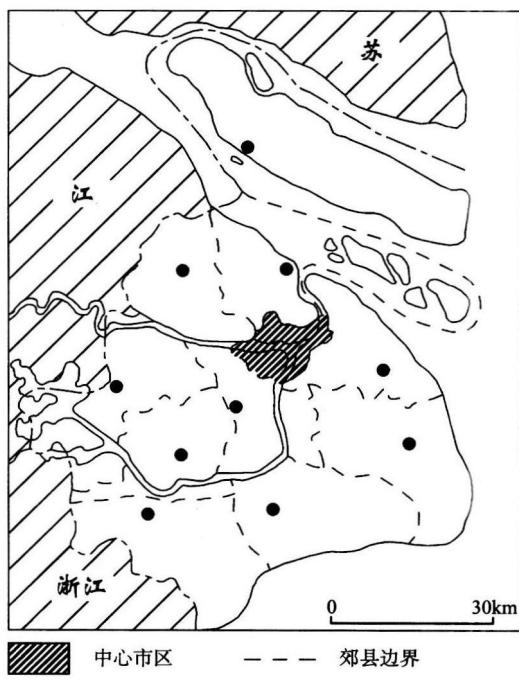


图 1.1 上海行政区（197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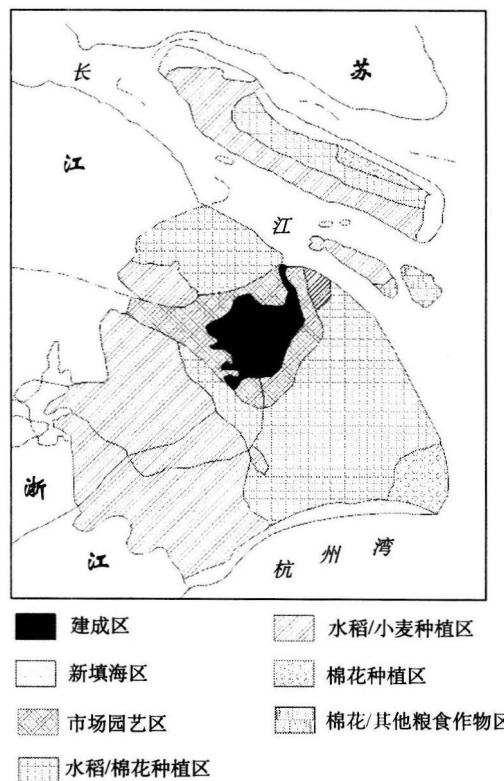


图 1.2 上海的土地利用（1970 年）

中国整个的人口又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是一种按照人们从事农业或非农业活动的职业上的分类。由于实行户口管理制度和粮油管理制度，非农业人口意味着由国家提供商品粮并有城镇户口的人，农业户口意味着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并是农村户口的人。因此，是否由国家提供商品粮成为了划分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依据^②。然而，这种划分方式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职业特征和居住地点。比如说，农村公社成员以合同工或临时工的形式在城市的非农业部门工作，历史上把他们归于“亦工

① 胡序威. 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剖析. 城市规划, No. 2, p24; Orleans,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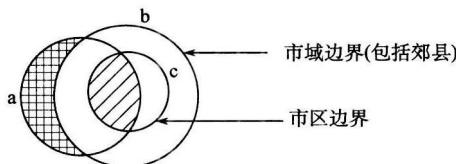
② 李成瑞. 从人口普查公报看中国人口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经济研究, No. 12, pp35~37.

亦农人口”。由于他们仍然是农村单位的成员，是农村户口，并且要从农村得到口粮、植物油等，他们必须向所在的农村单位交一定比例的收入。

由于这种多层次的划分，像上海这样的直辖市人口统计相当复杂，也很容易出现混乱。表面上能准确衡量上海城市人口的指标就有三个：TPM（市域总人口）；TPC（市区总人口）；NPC（城镇非农人口，根据户籍划分）。用维恩图（图 1.3）能很好地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a 为非农业人口，b 为市域总人口，c 为市区人口。三者的关系是：市域总人口包括市区人口；市区人口并不全部是非农业人口，还含有一部分的农业人口；而按照户籍划分的非农业人口也不一定全部居住在市里面，可能会以基层干部或技术人员的身份在农村居住。

在对城市人口概念理解和研究过程中，导致混淆产生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NPC 非农业人口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认为是“城市人口”，关于这点在后面部分将作详细说明。对于一些不带郊县的市来说，“城市”和“市”无论在地域还是行政上都不存在差别。因此，这类市的人口只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而无须考虑郊县等复杂因素。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不带乡的镇。据此，TPT 镇总人口划分为镇非农业人口（NPT）和镇农业人口。

基于城市/镇层次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城市人口统计（TPM, TPC/TPT, NPC/NPT），很容易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三种城市人口统计：市、镇域总人口（TPMT），城镇总人口（TPCT）和城镇非农人口（NPCT）。它们完整的定义在表 1.1 中给出。



人口特征：a 为根据户籍划分的非农业人口；b 为 TPM 包括郊县在内的市域总人口，不用于定义城市人口；c 为 TPC 市区人口

NPC 非农业人口 (1964~1981) 年间作为城市人口的狭义使用 [6 086 000] (方括号内的数字指 1981 年上海相应指标的人口数。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1, pp90~92)

在农村工作和居住的非农业人口，如基层干部、技术人员

图 1.3 维恩图表示 NPC、TPC 和 TPM 与不同城市人口概念的关系

表 1.1 在国家层面上的“城市”人口种类

类型	缩写	定义
市、镇域总人口	TPMT	TPM 和 TPT 的总和（如所有居住在市域和镇域内的人口）
城镇总人口	TPCT	TPC 和 TPT 的总和（如居住在所有城市和城镇里的人口）
城镇非农业人口 *	NPCT	NPC 和 NPT 的总和（如居住在所有城市和城镇里的非农业人口）

注：其他缩写及其对应的中文意思：TPM=市域总人口；TPC=市总人口；TPT=镇总人口；NPC=市非农业人口；NPT=镇非农业人口。

* 这些术语一般也简称城镇人口，而不使用“非农业人口”，因为后者往往容易导致混淆。须引起注意的是，不要把城镇总人口（TPCT）和城镇人口（NPCT）混为一谈。

1.3 城市人口的定义

中国政府所定义的城市人口一般是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居民。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城市标准适用于有着不同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因此研究者们认为，城市地区是由每个国家自己划分的，除非城市地区的非农优势这一基本原则在不断变化^①（陈道等，1983）。正如在现实中一样，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不仅仅是关乎规模等级的，更是关乎地区的割裂的，不可避免的有许多农业人口比例很小的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人口通常是从事商品蔬菜种植业，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外围。但是他们和住在城里的居民一样也在使用城市的基础设施，所以这部分人口必须要包含在城市人口总数当中^②。由此引出了下面关于中国城市人口定义的讨论。

在我国市域总人口（TPM）中从来就没有把该市所管辖的郊县人口划定在城市人口当中。郊县一般都是乡村地区^③。因此，这些由市所管辖的郊县的人口若计算为城市总人口，作为反映城市人口规模的指标，那就不准确了。同样，也不能用美国的标准都市统计区的规定（SMSAs）来套用中国的行政区（特别是那些代管郊县的市）^④。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根据非农活动和交换模式，中国大部分市的郊县是不符合标准都市统计区所定义的郊区的。此外，这些郊县既不是城市劳动市场的一部分，也不是城市交换区的一部分。除了非农优势以外，这二者是西方定义都市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⑤。因此，市的功能是作为城市规划单位，而不是本质上的城市单位。所以，如果用市域总人口作为衡量“城市”人口规模，那么就人为地夸大了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⑥。

进一步来看，目前在中国还没有明确的功能标准来决定每个城市应该有多少县被包

① 由于一个中文词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意思，因此在解释新报表和翻译中国材料时，人们需要格外注意“population of municipality”，“population of city”，“urban population”，因为这些概念时常交替使用。

② 很多学者就人口分类问题进行了探讨：马侠（Ma Xia），关于暂时性农业人口流动问题的探索，人口与经济，No. 1, pp10～13; Nicholas Lardy,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96～197; Marc Blecher, Peasant labour for urban industry: temporary contract labour, urban-rural balance and class relation in a Chinese county, World Development, Vol. II, No. 8, pp731～745; 姚士谋，吴楚材，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试论我国的亦农亦工人口，地理学报，Vol. 37, No. 2, pp155～162.

③ In countries where urban designation may not imply non-agricultural predominance. An additional explicit criter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may have to be introduced. See UNPD.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p9. This is not very relevant to China where the criterion of non-agricultural predominanc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must be met for most urban designations.

④ For example, the percentage of urban labour force engaged in agriculture ranged from 11.3%～22.8%, during 1950～1971 in Nicaragua, Peru, Romania and Turkey, ibid. pp. 9 and 74. Most of these urban farmers are found in small and medium cities and towns.

⑤ Other studies also confirm the same point, see Alan L. Eyre, "Shanghai—world's second city?"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Vol. 23, No. I (January 1971), pp28～30. And Norman A. Chance, China's Urban Village: Life in Beijing Commun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4). Chap. 2. Indeed, the suburban counties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rural villages).

⑥ 相关例子见：Morris B. Ullman, cities of Mainland China: 1953～1958 (Washington, D. 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Reports Series P-95, No. 59, 1961), p4.